

## 1941年日军对湖南常德的细菌攻击

陈先初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 1941年11月4日,日本第731部队远征队使用细菌武器对湖南常德发动恐怖袭击,由此造成大规模的鼠疫流行,夺去了7000多中国人民的生命。这次袭击是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精心策划的一系列对华恐怖行动的一部分,是日本违反国际公法、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罪证之一。

**[关键词]** 湖南常德;日本第731部队;细菌战;鼠疫

**[中图分类号]** R26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03)01-0065-05

## Japanese Army's Germ Attack upon Changde, Hunan in 1941

CHEN Xian-chu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On November 4th, 1941, Japan's No. 731 Expeditionary Army launched a terrorist attack upon Changde, Hunan with germ weapons, which caused spreading of the plague and resulted in 7,000 Chinese people's death. This attack was one part of a series of acts of terrorism upon China that was elaborately plotted by Japanese supreme military authorities. It was also one of the proofs that Japan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implemented national terrorism.

**Key words:** Changde; Japan's No. 731 Army; Germ attacks; the plague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为了从根本上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不惜违背国际公法,使用细菌武器对中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恐怖袭击。1941年日军第731部队远征队突袭湖南常德,便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 一 日本细菌战部队的组建和细菌战计划的炮制

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为着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相继建立了数支细菌战部队,其中有两支部队与本文所涉内容直接相关,一是总部设在东北的第731部队,二是总部设在南京的“荣”字第1644部队。日军对常德的细菌攻击就是由这两支部队联手进行的。

731部队的前身是东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教研室所属的一个细菌战实验所。该研究所成立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所长由石井四郎充任。以细菌学为主攻专业的石井四郎是细菌战的狂热鼓吹者,他深知细菌战的破坏力远非常规武器所比拟,乃以“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他种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必须寻求新式武器”为借口,极力主张日本研制“细菌武器”并“准备作细菌战”。<sup>①</sup>正是在他的鼓动下,由其一手主持的细菌实验所于1932年首次亮相。

必须指出,石井的行为乃至其后731细菌部队的成立,都是得到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直至天皇的全力支持的。1949

年,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中苏边界的伯力城(即哈巴罗夫斯克)对12名前日本陆军军人被指控所犯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罪一案进行了审判,审判期间,战犯们的供词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据前关东军军医处梶塚隆二供述,石井从最初开始从事其罪恶活动起,就得到日本参谋本部战略部方面的支持;石井所进行的一切研究,都是非常秘密的,他深恐他的名字会暴露出他在实验室内所从事的工作的真实目的,所以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东乡”,并将自己的研究所改名为“东乡部队”。

1933年,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批准,石井将细菌实验所扩建为“防疫研究所”。此时,日本早已侵占了东北,并在那里扶植起一个伪满洲国。于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根据准备北进苏联的战略需要以及更易于使用活人作细菌实验材料的考虑,在同年8月将“防疫研究所”从本土东京秘密迁至中国东北境内距离哈尔滨70公里的五常县背荫河地区,称为“加茂部队”或“奈良部队”。此时,细菌武器研究成了参谋本部军医学校的正式课题。

1936年,经参谋本部呈请并由天皇发布敕令,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两个庞大的细菌实验基地,以便从事先前已由石井在实施室中开始进行的罪恶实验。这两个基地,一个是由背荫河迁至哈尔滨南郊之平房并加以扩建而成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关东军第731部队”;一个是设在长春市以南5公里处的“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即“第100部队”。

**[收稿日期]** 2002-09-29

**[作者简介]** 陈先初(1955-),男,湖南常德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sup>①</sup> 《伯力审判:12名日本细菌战犯自供词》(以下简称《伯力审判材料》),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第97页。

除第731部队外,随着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日本又相继建立了其他一系列细菌战部队,如设在北平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甲”字第1855部队),设在南京的“中支那防疫给水部”(“荣”字第1644部队),设在广州的“南支那防疫给水部”(“波”字第8604部队),以及设在新加坡的“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冈”字第9420部队)。其中南京的“荣”字第1644部队又称“多摩”部队,建立于1939年。这支部队规模虽不及第731部队,但也不算小,其下设有12个支队,全部工作人员约1500人。它的第一任部队长是石井四郎,后来几任分别是太田澄、增田贞知、佐藤俊二,战败投降时为山崎新。第1644部队是第731部队南下华中进行细菌战的重要基地,并是其细菌武器的提供者之一,<sup>①</sup>战时发生在华东及华中地区包括常德在内的几次细菌战就是由这两支部队联手进行的。据佐藤在伯力审判席上供认:“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与关东军第731细菌部队一起曾于日军作战时期,直接参加过用细菌武器反对中国军队及当地居民的动作。”<sup>②</sup>日本细菌战部队的组建,就是为了发动细菌战,而当其组建完成后,其细菌战准备工作也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这些准备包括疫蚤的培养和繁殖、以人体为标本的各种试验等等,也包括细菌战计划的实际制定。

据伯力审判材料,日本正式制定准备发动细菌战的计划是1941年及其以后的事。但事实上,在此之前,第731部队已于1939年8月在中苏边境的诺门坎战役中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细菌战实验,在哈勒欣河撒下了肠伤寒和沙门氏菌。1940年10月,731部队又派远征军前往浙江宁波一带,用飞机撒播带有鼠疫病菌的跳蚤。前一次实验由于缺乏适当的撒播手段,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sup>③</sup>后一次则造成了鼠疫在宁波一带的流行。宁波细菌战的成功,使日本受到鼓舞,证明他们研制出来的“秘密武器”及投放方式是非常有效的。于是在此之后,日本便开始具体制定进一步发动细菌战的计划,并对细菌武器的使用方法在现有的基础上加以完善。

1941年春,这种工作正式开始了。梶塚隆二在受审时是这样说的:

1941年2月,第731部队长军医大佐石井,经关东军总司令梅津允许后,在长春城的办公室内向我报告该部队工作情形时,向我叙述过该部队内在准备细菌战方面所进行的事情。……据石井说,由于该部队内进行实验的结果,业已查明将细菌直接装在飞机弹内投散的方式是少有成效的……从飞机上散布细菌,如像施放毒气那样,其效力较大。……石井还对我说,效力更大得多的细菌投掷法是不把细菌“赤裸裸的”投掷下去,而是把它同媒介物一块,即同虫类,特别是同跳蚤一块投掷下去。跳蚤是最富有生命力的虫子,把跳蚤染上鼠疫后,就从飞机上投掷下去,而寄存在跳蚤体内的鼠疫菌,便能顺利地同跳蚤一起落到地面上。……同时,石井对我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尚未结束,例如,究竟从高空投下的跳蚤能散布到多大面积这个问题,就还没有弄清楚。

梶塚的供述表明其时业已开始的细菌战准备是经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允许,而由第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具体进行的。石井对用飞机投掷染菌跳蚤的方法的肯定,显然来自宁波的“实验”,这为当时日军内部所普遍认可。当然石井还有未“弄清楚”的一些问题,因此在那之后石井再度几次率远征军南下华中地区,目的之一是要继续“在具体战斗环境

内进行探求大量散播细菌方法的实验”,但如同柄泽所供认,“其实这也就是把细菌用作战争武器去攻击中国军队。”<sup>④</sup>

1941年6月,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苏德战争爆发。德国的东进兴奋了日本,日本军部趁机加紧对苏备战,一方面组织所谓“关特演”(即针对苏联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以便能在战局有利时实施“北进”;同时旨在发动细菌战的实际准备进一步加紧和展开。为此,日军参谋总长向第731部队下达了加紧准备细菌战武器的命令。川岛清供称:

1941年夏季,当苏德战争开始后,有次我去访问石井将军时,本部队内两个部长村上中佐和大谷章大佐也在场,石井将军说到必须加强队内工作,并对我们宣读了日本参谋总长的命令,命令上要求我们加紧研究鼠疫细菌,作为细菌武器。该命令中特别指出,必须大量培养跳蚤作为散布鼠疫媒介物。这个命令是用墨笔写的。<sup>①</sup>参谋本部下达这样的命令,除了主要基于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的战略考虑外,石井也起了一定作用。还是川岛的供述:

我记得,1941年6月,当石井将军从东京转回来后,他把本部队各部部长召集到自己办公室内开会,当时他通知我们说,他向日军参谋本部报告过,说第731部队已研究好了用染有鼠疫跳蚤作为细菌武器的方法,说这方法所达到的成绩可以大规模地实际用去达到战争目的。石井告诉我们说,参谋本部对本部队工作成果极为赞赏,并指示我们要特别注意改进并继续研究细菌作战武器。<sup>②</sup>

石井当时完全接受了参谋本部的指令,并表示立即照办:

石井将军作过这番通知后,就号召我们更紧张地工作,以便提高部队内繁殖跳蚤的生产率,更加扩大跳蚤产量。同时石井又指出说,本部队在最顺利情况下第三、四个月内还只能繁殖60公斤跳蚤,但现在必须扩大跳蚤产量,以求在同一期间能生产出200公斤。石井将军向我们解释说,上述一切扩大细菌武器生产办法之所以必须实行,是因为国际形势已发生变化,即德国对苏战争已经开始,以及因为关东军中已在实施反苏军事措施准备的“关特演”计划,所以我们军队应当充分具备有细菌武器,以便能在必要时去反对苏联。<sup>③</sup>

谈到参谋本部指示要加紧进行细菌战的计划和准备,被告高桥隆笃也有明确交代,不过高桥的消息来源不是石井,而是比石井职位更高的梅津美治郎:

关于准备细菌战的计划,我是在1941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从关东军总司令梅津口中知道的。<sup>④</sup>

1941年9月,前任关东军总司令梅津在军司令部内一次部处长会议上通知说,帝国大本营参谋本部发来了一道命令,要关东军准备进行细菌战。梅津在这次会议上就命令第731部队长官石井开始大批培养传染病媒介物。从那时起,我就知道第731部队在准备细菌战。<sup>⑤</sup>

这里已经清楚地表明,准备开展细菌战的命令来自日本最高军事当局,即帝国大本营参谋本部。它经由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传达到731部队长石井四郎,最后由731部队具体实施。山田乙三也曾谈到这一点,此外他还谈到一些新的有关细菌战准备的细节,如曾组织专门委员会决定细菌武器的使用问题。山田供称:

为了研究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如曾组织有几个专门

① “731部队有五十多处细菌输送点,主要有安达、长春、沈阳、白城子、南新京、海拉尔、黑河、孙吴;关内有天津、青岛、南京、上海、杭州。这些城市的收发点都在郊外。”(山下井口供,1952年5—6月。见《日军侵华暴行总录(一)》,第227页)。

② 《伯力审判材料》,第64、86—87页。

③ 《远藤三郎日记》,1985年《每日新闻》。转引自《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第234页。

④ 《伯力审判材料》,第58、97、99、44、47页。

委员会,委员为关东军参谋长、作战部长、第100细菌部队长和第731细菌部队长以及司令部的个别军官。各该专门委员会主席是由参谋长担任。关东军总司令未曾参加这些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关于使用细菌武器的决定,均交由关东军总司令批准,然后呈报日军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当批准了某种武器时,即将此种决定通知关东军司令部,然后再由关东军司令部颁发大量生产必要病菌的相关命令给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根据参谋本部关于生产此种或彼种细菌武器的要求,日本陆军省曾保证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以一切必要的设备、原料和材料。<sup>①</sup>

山田是于1944年起担任关东军总司令的。但是他说:“所有被采纳为关东军作战方法的细菌武器使用法,都是我受任为关东军总司令以前由日军参谋本部审核和批准的。”“当时我个人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从飞机上散布细菌,因为这种办法能够传染广大的面积。”“此外,根据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指令,我又以总司令资格经过本司令部所属各部处领导过第731号和第100号两细菌部队研究与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我以关东军总司令资格负的任务,并且是要在作战期间对使用细菌武器一事实行战术上的领导。在这方面,当一旦发生战争时,我就应该决定究竟用什么兵团以及在哪些方面必须使用细菌武器。”<sup>②</sup>

当然,最终决定“使用细菌武器的命令应由帝国大本营颁发。”山田此处的说法与前述梶塚、川岛中的说法大体一致,即他们都强调了从大本营参谋部到关东军司令部直至第731(还有第100)部队这一垂直状态的细菌战的组织体系。至此可以看出,包括关于细菌武器的选用和生产、细菌武器的使用方法、细菌战的决策指挥及组织动员体系等等在内的一整套准备进行细菌战的罪恶计划,到1941年以后已经精心炮制出来了。

## 二 石井部队远征队对常德发动“细菌攻击”

日军对常德的细菌攻击发生在1941年11月4日。是日“早上六时许,天刚破晓,浓雾弥漫,常德市区发生了空袭警报,随即有巨型日寇飞机一架由东向西低飞,在常德市上空盘旋三周后,又从西门外转折市空。当其折转低飞时,没有投掷炸弹,而是在市内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巷以及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带,投下大量的谷、麦、豆子、高粱和烂棉絮块、碎布条、稻草屑等物。尤以关庙街一带,投下的数量多。”<sup>③</sup>当时常德市民非常惊异,互相奔告,不知是一回什么事,但是他们的惊异很快就代之以以前所未有的恐怖:原来日机空投下来的是受到鼠疫杆菌感染的跳蚤,这种由跳蚤携带的鼠疫菌极易传染且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致人死命!

日机的行为十分诡秘,至今人们对日本的这一罪恶活动主要还是只能根据当年的医院诊疗记录及有关部门的防疫报告加以了解,而日本方面的有关罪证材料,要么早已被销毁,要么仍然尘封在某个不为外界知晓的密室。然而如此骇人听闻的恐怖犯罪,要绝对隐瞒起来是不可能的。

下面是来自伯力审判席上的历史信息:

川岛清:1942年,第731部队奉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派了一个约100人的远征队,前往华中浙赣地区去使用细菌武器反对中国军队。此外,第731部队又于1941年在常德城一带,使用过细菌武器攻击中国军队。1940年,该部队远征队在

宁波地区使用细菌武器攻击中国军队。<sup>④</sup>

“我随731部队远征,一次在1941年,另一次在1942年,日军曾用致命的细菌当作武器进攻华中中国军队。记得第一次是在1941年的夏天,有一天,第二部部长太田大佐告诉我:他将前往华中,并向我告别。不久他就回来了,又告诉我,曾用飞机在华中洞庭湖附近常德一带上空投掷大批鼠疫跳蚤,他把这件事称为‘细菌攻击’。其后,太田大佐向石井报告,我也在座,他说731部队的远征军曾在常德地区用飞机散布了许多鼠疫跳蚤,结果造成了该区瘟疫流行,使许多人民患了这种时疫。参加此次细菌战争的工作人员,约四五十人,所采用的方法,就是用飞机在高空中把鼠疫跳蚤投掷下去,并没有用细菌炸弹,仅用粉碎机,把跳蚤散布下去。”<sup>⑤</sup>

柄泽十三夫:“1940年和1942年期间,第731部队派出两次特别远征队去使用细菌武器反对中国人民。”<sup>⑥</sup>而“在1941年举行的这次动作中只使用过鼠疫。”<sup>⑦</sup>

上述材料证实了1941年发生在常德的细菌攻击的确是关东军第731部队“远征军”所为,这个远征军约四、五十人,它由第731部队所派遣,直接指挥者是太田大佐,使用的细菌武器是鼠疫跳蚤。而据伯力军事法庭上苏联国家公诉人根据所掌握的更多的证据所作的指控:这个“远征队曾有30个细菌学专家参加,全队人员总数达100人”。<sup>⑧</sup>

关于此次第731部队远征队对常德的细菌攻击中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起到了何作用的问题,现在尚未发现更多的详细资料予以说明,但从佐藤的供述中我们还是可以得知一二。下面是一段关于对佐藤的审讯记录:

问:石井四郎与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有过什么关系呢?

答:在该部队初一成立时,石井担任过部队长。

问:在石井离开后主持“荣”字第1644部队的是谁呢?

答:接任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长的是太田大佐,他先前也在石井部队中服务。

注意:直接指挥常德细菌战的太田澄大佐曾经担任过第1644部队的部队长!经查,这个太田澄原毕业于冈山医专,是个医学博士。除担任过第1644部队长外,还曾出任过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长。1941年从1644部队离任后,被调往石井部队,任该部队总务部长兼第二部(实验部)部长、军医大佐。发动常德细菌战正是他到石井部队不久之后的事。而石井则曾经是1644部队的首任部队长,是他亲自选中了太田一度作为自己在第1644部队中的继任者。由于太田和石井的这种特殊关系,由第1644部队协助石井部队远征队的细菌战便是很自然的。

继续看对佐藤的审讯记录:

问:被告佐藤,请你说出你关于“荣”字第1644部队曾帮助第731部队对中国居民进行细菌攻击一事所知道的一切。

答:当我在“荣”字第1644部队供职时,我曾亲自听到太田大佐及小野寺中佐说,1940年在宁波一带,1941年在常德一带,1942年在浙赣一带动作时,均使用过细菌武器,并且当时所使用的,都是从飞机上撒放的鼠疫跳蚤。……

问:换句话说,“荣”字第1644部队供给过石井部队远征队相当数量的跳蚤,以使用来传染鼠疫,对不对?

答:对。

问:第731部队远征时到达南京时驻扎在什么地方呢?

① 《伯力审判材料》,第81、82、83、51、260、57、220页。

② 邓一睦. 日寇在常德进行细菌战的经过,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③ 《伯力审判材料》,第396—397、257、258—259、64页。

答:是驻在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宿舍内。

问:那末,在石井部队远征队到达华中时,“荣”字第1644部队曾是该远征队的基地么?对不对?

答:对。<sup>①</sup>

还有前面引述过的佐藤的另一段供词:“这两个部队都曾从事研究和大批生产过用以攻击中国军民的致命细菌,……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与关东军第731细菌部队一起曾于日军作战时期,直接参加过用细菌武器反对中国军队及当地居民的动作。”<sup>②</sup>

佐藤供词中虽然没有十分明确地谈及“荣”字第1644部队如何具体协助完成了第731部队远征队在常德的“动作”,但他承认南京是远征队的细菌战前方“基地”,“荣”字第1644部队曾为远征队提供过“相当数量的跳蚤”,等等。即便这些不足以直接证明第1644部队派员参加了对常德的细菌攻击,但可以肯定的是:“荣”字第1644部队是石井部队在常德进行细菌战犯罪的重要同谋。

关于日军发动常德细菌战的史料,除伯力审判记录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比如1954年6月榊原秀夫<sup>③</sup>的笔供讲到,常德细菌战“是石井亲自进行的”。<sup>④</sup>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一份战后一直保存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的当年日本陆军军官业务日记(即《井本日记》)的公开披露,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常德细菌战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

结合新发现的日军细菌战史料,日军对常德进行细菌战攻击的事实已大致明朗:1941年9月16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以陆军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布“大陆指”,命石井再次组织一个华中“远征队”对中国战区和城市实施细菌攻击,具体目标为湖南省的常德市。同时“大陆指”规定,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破坏通向中国大后方重庆的重要交通要线;同时也是为了通过“使用鼠疫跳蚤,实验它从高空投下时,究竟有多大的效果,能否列为今后细菌战中具有攻击性的重要细菌武器,试验其可靠性有多大。”<sup>⑤</sup>

这次细菌攻击,石井没有亲自出马,而是派其得力助手太田澄大佐以及淀常重中佐担任此次作战的现场指挥,随行人员共100余人。经过一番精心的准备,行动正式开始。11月4日“早晨接到报告说目标方向天气好”,正在南昌机场待命的由石井部队航空班增田美保少佐驾驶的一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随即起飞,时间为5时30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于6时50分飞抵常德上空。据井本日记记载,其时“大雾,降低H(高度)搜索,在H800m附近有云层,故在1000m以下实施(由增田少佐驾驶,一侧盒子未完全打开,在洞庭湖上[应为常德上空一引者注]将盒子掷下)。谷子36公斤,其后由岛村参谋进行搜索。”“谷子”是疫蚤的代称。这就是说,增田所驾飞机将36公斤疫蚤装在两侧盒子里,一侧盒子里的“谷子”在常德上空投下,另一侧的盒子则由于未完全打开而直接投下来的。

日军对这次行动的效果进行了跟踪,情报不断得到反馈。井本日记继续写道:“6/11(11月6日)常德附近出现中毒流行……20/11前后,出现来势迅猛的‘鼠疫’流行,根据各战区收集的卫生资料判断,‘如果命中,发病应该属实’。”12月2日,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宫野正年大佐向井本提交报告,称“以常德为中心的湖南省‘鼠疫’极为猖獗。”又据榊原秀夫笔供,1942年2月他在汉口第11军参谋部情报录中看到一份由常德报到香港

的电文,内称“日军的飞机一架投下像笼子的东西,此后在住民当中发生鼠疫患者七八名,以后还可能继续发生,……”<sup>⑥</sup>

如前所述,作为现场指挥的太田澄就此次行动在出发前与返回后都向川岛清以及石井作了报告,在返回后的报告中他也说,他指挥的远征军用飞机在常德地区撒布了许多鼠疫跳蚤,“结果造成了该区瘟疫流行,使许多人民患了这种时疫。”他还得意地宣称,这次细菌攻击“非常成功”,“按原定计划实现了预期目的”;现在,“常德市发生的鼠疫在流行,还在向四郊农村、郊县蔓延!”<sup>⑦</sup>(P198)

井本日记的记载应该是基本准确的,只是其中谈到的飞机从空中投下的36公斤鼠疫蚤,应该是同大量的谷物、絮棉等杂物混在一起被装在“盒子”(即榊原所称“像笼子一样的东西”)里然后投下的。至于太田澄报告中大谈特谈非常成功的鼠疫大流行,当时不免有表功之嫌,但从中国方面所保存下来的大量历史档案资料看,说此次细菌战造成了鼠疫大流行却一点也不夸张。

### 三 因日军细菌攻击引发的常德鼠疫大流行

当日机飞临常德市上空时,常德城区拉响了防空警报。警报解除后,常德防空指挥部、警察局及各县、镇公所将敌机所投部分物品收集起来,取其少许送至当地的广德医院进行检验。时任广德医院副院长的谭学华博士和该院检验医师汪正宇对可疑物品进行了检验。

据汪正宇1942年发表的《敌机于常德首次投掷物品检验经过》所述,收到送来的检验标本后,他马上意识到,“除敌人用一种神经战术,使吾人恐怖外,那最可能的便是散布传染的细菌了。若是散布细菌,那么便是鼠疫杆菌。”他所依据的理由是:“(一)鼠疫为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其传染甚速,并且死亡率高;(二)所投下的谷麦等物,均为鼠类的食料;(三)本地之鼠甚多,便于鼠疫的传播;(四)根据记载,敌人曾在浙江衢州等处投掷过鼠疫杆菌,所以此次亦有可能。”<sup>⑧</sup>于是,汪正宇详细记录了对投掷物的检验过程及其结论。

谭学华也对送来的标本及时进行了检验。他先“用这种谷物放在无菌生理盐水中沉淀,再取其沉淀作涂抹片用革兰氏的染色法染色后,在显微镜下发现这些谷物内有多数的革兰氏‘阳性杆菌’和少数‘两极着色杆菌’。根据这种初步检验的结果,谭学华怀疑日机散布的是鼠疫杆菌,乃作第二次检验,将日机投下的谷麦和(从)杂粮行取来的普通谷麦作比较培养,又发现日机投下的谷麦沉淀中除有多数革兰氏‘阳性杆菌’外,并有少数革兰氏‘阴性两极着色杆菌’。更使谭学华认定日机所散布的是鼠疫杆菌。”<sup>⑨</sup>谭学华将他的检验经过及结论写成文字发表于1942年3月1日出版的《国立湘雅医学院院刊》上,这份报告与汪正宇的报告一道,成为非常重要的证实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第一手资料。

在敌机投物后的最初几天里,还没有发现特别异常的情况,但仅仅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情况就变得严重起来。“11月11日,有多人传说城内某地一带多有死鼠发现,和急症的病

① 《伯力审判材料》,第64页。

② 榊原在侵华战争期间以军医身份在日军服务,曾任日本关东军第10师团防疫给水部少佐部长,关东军731部队第162支队(林口支部)少佐支队长等职。

③ 《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9月出版,第282页。

④ 《细菌战与毒气战》,第282页。

⑤ 载重庆医药高专《医技通讯》,1942年2月。

⑥ 《谭学华,吕静轩两医师追述当时检验情形》,《新湖南报》,1950年2月6日。

人在起病后一二天内即行死亡！”<sup>①</sup> 不过当时没有人将死鼠送医院检验，也没有将急症病人送往医院诊治。然而过了不到一天，第一个病例就在广德医院出现了。

11月12日晨，家住城中关庙街的一名年仅12岁的女性患者蔡桃儿被送至广德医院，这个女孩在头天晚上已经发病。谭学华医师随即对其作血液涂片染色检查，发现有少数两极着色较深的杆菌，同敌机投掷物中所发现的细菌相似；结合患者居住地以及患者发病日期等因素综合判断，该病例属鼠疫症已经无疑，因此，决定收留其住院治疗。入夜，患者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于13日上午9时许死亡，此时距发病时间仅36小时。为进一步确证病例性质，医院对死者进行了尸检，结果与先前的结论一致。

继蔡桃儿之后，又接连发现类似的病例，仅在13、14两日，就有蔡玉珍、聂述生、徐老三等三人死亡。经检验，死者体内无一例外地发现有“类似鼠疫杆菌的微生物”。

鼠疫患者的不断出现和死亡，表明疫情已经发生且将蔓延，于是常德方面紧急报告中央卫生署、省卫生处以及红十字总会，请求采取紧急防疫措施，随即一批鼠疫防治专家先后到达常德。16日，卫生署派来了一个防疫大队，负责人为石茂年。18日<sup>②</sup>，由省卫生处主任技正邓一赓率领的一支50余人的省医疗防疫队也到达常德。两支队伍抵常后，随即展开了疫情调查，并与有关各方紧急会商防疫办法。后者还宣布成立了常德联合防疫处（后改为湘西防疫处）。稍后不久，一支由陈文贵率领的“湖南常德鼠疫调查队”也于20日从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所在地的贵阳出发，24日抵达常德。在为时一个多星期的调查中，陈文贵一行解剖了死者龚胜操（有作龚盛操者）的尸体并对其作了细菌培养和动物接种等实验，证明患者所患为真性腺鼠疫，系由鼠疫菌引起败血性感染而死亡；同时又对此前五名死者的临床记录进行了复查和研究，结果证实：“对于死者之诊断为鼠疫似尚无疑。”<sup>③</sup> 据此，陈文贵在所提交的《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中判定：“自十一月十一日起，在‘空袭’七日后，常德即有腺鼠疫之流行”。

另外，12月21日，一位名叫伯力士（R·Pollitzer）的德籍犹太人鼠疫防治专家亦受重庆国民政府卫生署委派到达常德，负责开展剖验老鼠和测定跳蚤的工作。伯力士“在常德工作了两个月光景，解剖了五、六千只老鼠，断定常德市流行的是老鼠和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sup>④</sup>

鼠疫是一种发病极快、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的烈性疫病，可以想见，当常德发生鼠疫的消息传开后，人们是多么惊恐！尽管地方当局及各有关部门对其进行了积极的防治，但是并未能阻止鼠疫在常德的流行。鼠疫的流行不仅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折磨，而且无情地吞噬了无数无辜者的生命。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大规模的鼠疫流行在常德一共发生了两次，但是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经过调查后认定，不是两次而是五次！实际上不论是两次说还是五次说都不能完全反映当时鼠疫流行的惨状，因为至少在鼠疫发生后的最初两年里，因疫致死的惨事几乎一直没有停止过。

如前所述，11月13日不治身亡的蔡桃儿是第一个有记录的鼠疫受害者。继蔡之后，死者不断增加，疫情迅速蔓延。据邓一

赓回忆：“继蔡桃儿死后，关庙街、鸡鹅巷一带相继发生病例多起，往往不及医治而死。染疫人数一天天增多，平均每天在十人以上，传染极为迅速，一人有病，涉及全家。……疫势严重地蔓延，市民们谈虎色变。”<sup>⑤</sup> 由于最初一段时间内检疫所尚未成立，疫情情报网也不够健全，估计有大量死者未被发现。另外，为逃避检疫隔离和对死者进行火化，人们尽量将病人和死者隐瞒不报，自行处理。曾参与常德鼠疫防治的刘禄德说：“鼠疫发生后，虽然中国人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常德仍然被细菌害死了许多人。常德城内棺材都没得买，死的人最后就用棉絮、布条包裹后掩埋。我刚来时，看到的夜间出殡就是当地人不愿焚烧尸体，趁夜间偷抬出去掩埋的。”<sup>⑥</sup> 邓一赓认为这段时间内死于鼠疫的约在600人以上，恐怕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这之后有过一段较为短暂的缓和期，但其时携带疫鼠菌的老鼠却在不断大量增加。<sup>⑦</sup> 鼠疫在鼠族中的流行，进一步波及人类，因而常德鼠疫从1942年3月下旬开始再度猛烈爆发。自3月下旬发现两名患者死亡开始，至同年7月，常德城区又有34人染疫，其中29人死亡（容启荣报告为31例）。但是这些只限于医院的统计数字，只不过是实际患者的一部分，更多的疫情由于前述原因未能上报。

鼠疫不仅在常德城区肆虐，而且向周边地区蔓延，1942年5月波及与之毗邻的桃源县。该县漆家河莫林乡李家湾一位名叫李佑生的在常德做生意染上鼠疫后潜返回乡，随即病情加剧，不治身亡。因受李佑生传染，其家属、邻居和前往看望的亲友等也都相继染病，仅20天时间，导致至少16人死亡。一位前往超度亡灵的临澧籍道士也未能幸免。

距常德城22公里的石公桥，1942年1月曾有2人在县城染疫后死亡。此后一段时间内相对平静，但进入10月份以后，鼠疫又再度流行。据湖南省防治常德鼠疫工作报告，<sup>⑧</sup> 自10月27日至11月24日，共计发现35个病例，死亡31例，其中张春国一家死5人，丁长发一家死11人（含雇工3人）。另外，距石公桥5公里处之镇德桥于11月20日发现2名死者，至25日止共有9人死亡。综计以上两处，共发现44人染病，其中40人死亡。另据其他资料记载，<sup>⑨</sup> 此次石公桥、镇德桥染疫死亡人数为43人（其中包括可疑患者7人），但这一数字与真实数字相去甚远。据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调查，这一地区实际死亡230多人。

当石公桥一带鼠疫初发之时，一个名叫魏乐久的帮工染上疫病后被抬回常德县韩公渡家中，于1942年12月的一天不治身亡。随即，鼠疫在韩公渡一带传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即有70多人死亡，其中牛牯坡死30多人，邻近的花田坡死40多人。

上述鼠疫流行情况，一部分来自当年的疫情报告及防治工作报告，同时补充了一些后来的调查资料。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当年因染疫致死者共100多人，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只是来自医院或隔离所的统计数字或由防疫部门所掌握到的情况，而更多的死亡人数当时根本无法统计上来。根据近些年的大规模实地调查，那次鼠疫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上述数字，达到7643人，受害区域有13个县、70个乡、486

（下转第83页）

① 载重庆医药技专《医技通讯》，1942年2月。

② 据谭学华1972年回忆，邓一赓说是11日，后者可能有误。

③ 邓一赓：《日寇在常德进行鼠疫细菌战的经过》。

④ 《湖南文史资料》第18辑。

⑤ 徐先明：《走过细菌沼泽的天使——记四十年代参加扑灭鼠疫的细菌战的刘禄德先生》（油印本）。

⑥ 见鼠疫疫情紧急报告1942年3月17日第24号；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疫情旬报1942年3月中旬第2号。原件存第二历史档案馆。

⑦ 原件存湖南省档案馆。

⑧ 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疫情旬报：1942年12月上旬，第26号。

神负担的王国。尼采关于“欠债的内疚”的洞见与弗洛伊德关于沉思的人的观点结合在一起显示了所有的影响都是魔鬼化的,对它的抵制则是英勇的。他的六种修正比连同它们含义丰富而综合性极强的名字听起来就像去邪的连祷。他认为历史的动态学不是被一个必要的天使所掌握,而是被一个必要的魔鬼——“连续性的魔鬼”所掌握,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恐惧、颤抖、拯救,而是奸诈、盛怒和幸存。

纵观布鲁姆的论述,我们发现布鲁姆谈论的影响都是历时的,没有涉及到共时方面,但是我们知道影响不仅仅是历时的,还有共时的。说文学的基础是影响就是说文学具有互文性,互文关系必定包含一个阐释的时刻。所以,布鲁姆关于文学的影响的理论只不过是互文性理论的一部分,他对影响的阐释和六种修正比名称的由来都体现了这一点。而且影响的焦虑夸大了影响的负面影响,忽视了它的启迪作用,有“避重就轻”之嫌。但是这本书的重要见识就在于布鲁姆称之为“有意误读”的阅读方式的分类。至于是否使人们认识到“一

个诗人促使另一个诗人成长”的非完美性和是否培育出更加切实可行的一代诗评,起到布鲁姆所期待的“矫正作用”还有待研究,毕竟“这本书没有怎么引起专门化的关注”。虽然本书的副标题标明是“一部诗歌理论”,但它不是真正的诗歌理论,倒是与华莱士·斯蒂文斯的一句诗歌的字面意义相吻合,“诗歌的理论/就是生活本身的理论”。<sup>[3]</sup>

### [参 考 文 献]

- [1] 徐文博译.影响的焦虑[M].北京:三联书店,1989.
- [2] Jonathan Culler, "Reading and misreading"[A]. Yale Review [J], Vol. LXV, No. 1, October, 1975, pp. 88—95.
- [3] Paul De Man, "Book Reviews: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J], Vol. 26, No. 3, Summer, 1974, pp. 269—75.

### (上接第 70 页)

个村之多,其中因疫死亡 30 人以上的村子有 60 多个。<sup>①</sup>此外,据老人们回忆,当年有湖北襄樊的盐贩子自常德染疫回老家后死亡者;有来常德唱戏的外地艺人染疫后慌忙回籍而骤死途中者;还有在常德做鱼、米生意的外地人客死常德,其家人将其运回老家安葬者。这些是很难进入统计数字的。

不堪回首的那一幕已过去六十余年,六十年一个甲子。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但历史仍在鸣响着警钟。据常德市卫生防疫站和桃源县卫生防疫站的监测报告,1990 年和 1991 年两次在当地所捕获的老鼠中检验出鼠疫 F1 抗体阳性血清 3 份,经吉林省白城市全国鼠疫病防治基地复判确认,这表明构成鼠疫的潜在危害仍未全部消失。而另一方面,战争结束已经半个多世纪,日本如同拒不承认其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一样,至今仍然对其在华所犯细菌战罪行百般抵赖。长期以来,日本不肯公布其保管着的关于细菌战的资料,这些资料在战争结束时曾被美军缴获。1986 年,在美国下院复员军人委员会赔偿委员会上,美国防档案管理部部长哈切证实,有关日军细菌战部队的资料在 50 年代后半期已经归还日本。

据日本国会图书馆称,这些资料先被交给外务省复员局,后又移交给防卫厅战史室,现在仍被尘封着。

历史不容忘记,不容隐瞒,更不容歪曲。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为了申张正义,促进和平,国内一支由受害者亲属及志愿者组成的民间诉讼团在对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全面调查并大量取证的基础上,向东京地方法院多次提出诉讼,控告日本违背 1925 年制定的《日内瓦公约》对平民使用细菌武器,要求日本向细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认罪并赔偿损失。常德一批受害者亲属及历史工作者也参加了这种调查和诉讼活动,为此成立的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已经并且仍在积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毫无疑问,不论日本认罪与否,中国人民、常德人民一定要彻底清算日本欠下的这一笔血债!

### [参 考 文 献]

- [1] 佟振宇.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哈尔滨出版社,1998.

<sup>①</sup> 据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 2000 年 12 月的统计。